

哲学与时代

● 邢贲思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哲学与时代

邢 贲 思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哲学与时代

邢贤恩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6插页 379,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

统一书号：2106·88 定价：2.90元



邢贲思，浙江嵊县人，一九二九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哲学和启蒙》、《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目 录

序言	[1]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4]
恐右症的来历	[10]
对当前思想解放运动的认识	[14]
我们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21]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56]
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局面	[62]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	[70]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一书序	[75]
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遗产，发挥哲学的指导作用	[84]
毛泽东同志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光辉典范	[91]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	[97]
振奋共产主义精神，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而奋斗	[103]

略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09]
两个文明的建设 and 知识分子的作用	[115]
为什么要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	[122]
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128]
为什么要学习和掌握正确的方法论	[136]
要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141]
关于人生观的若干问题	[145]
关于哲学学习的若干问题	[157]
哲学和政治	[179]
《反杜林论》和我国当前某些哲学问题的争论	[192]
华岗著《规律论》一书序	[212]
必须加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218]
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任务	[223]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229]
什么是社会意识	[234]
对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一些意见	[246]
关于人道主义的一些问题	[250]
关于异化问题的争论	[263]
关于异化的几个问题	[269]
社会主义异化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284]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 最初形态	[297]

启蒙运动和人道主义	[311]
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	[320]
关于费尔巴哈研究的若干问题	[354]
费尔巴哈哲学思想述评	[380]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	[424]
费尔巴哈和波墨	[452]
对《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几个问题的理解	[460]
正确的人生观要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导	[469]

序 言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四十二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作者近年来撰写的。这些文章当然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有什么深刻的阐发，但是它是作者对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的部分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哲学思索。作者历来认为，哲学既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就首先应当反映这个时代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反映人们在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反映人们在头脑中正在思考的问题。离开了这些，就谈不上什么时代精神的精华，这样的哲学就会成为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成为一种僵死枯槁的东西。一个新时代的哲学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和思想战线的其他战士一道吹响时代的号角，使人们受到鼓舞，受到感奋，并给人们以某种哲理的启迪。他们不应当满足于在书本上讨生活，更不能满足于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研究古代哲学的人当然不在此列），而应当勇于探索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宇宙人生问题，进行严肃的独立的思考。也许这是一条艰险得多的道路（从两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艰险的，一是这种探索要付出艰苦得多的劳动；另一是这种探索由于可能触及某些敏感的问题而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但是这又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每一个对于时代抱有责任感的哲学工作者所应当选择的道路。

对于哲学应当反映时代，我们的认识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对于哲学教学、哲学研究的正规化（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哲学教学、哲学研究要有一定的系统性，这是不待言的）比较强调，而对于面向生活、调查研究、联系实际则注意得不够，以致不少同志孜孜矻矻，终日埋首书本，而对于实践的呼声、群众的呼声几乎不闻不问。一些同志满足于搞书斋哲学，在自己的咫尺天地里迷恋徜徉，而没有看到哲学的天地要大得多，没有能投身到时代的熔炉中去，同人民群众一同接受锻炼。对于这样一种远离生活、远离实践、感受不到时代气息的哲学加以针砭，以期它能弃旧图新，这是必要的，有助于哲学的发展。

但是在反对这种倾向的时候，我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哲学反映时代理解得过于简单。有一个时期，似乎哲学教学、研究中的正规化、系统化也不敢提了，研究哲学的人读大量的书、看大量的资料、做大量的笔记也成了多余的了。有人认为既然哲学植根生活，那么只要走向生活，一切哲学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事实证明，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些简单化的做法（如把大学哲学系搬到农村之类），并不能真正解决哲学反映时代的问题。

哲学必须反映时代，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能动摇。哲学怎样反映时代，这是一个方法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不尽相同，应当允许人们有不同的认识，运用不同的方法，作出各自不同的尝试。在这里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真总结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防止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

由于哲学反映时代这个问题对于哲学工作者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尽管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未必恰当，在实践上也未必做得好，还是不避浅陋，把近年来的一些试图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实

践的文章，和一些进行某种理论探讨的文章，结集出版，以向理论界的同志、向广大读者求教。同时，作者也希望这本集子能够成为引玉之砖，能够引来更多的理论联系实际、反映时代和反映生活的哲学论著。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legible][illegible]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最近收到一些同志来信，就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一种认识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是真理，靠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史上众说纷纭，没有一种学说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唯心主义哲学不必说了，有的把真理标准归结为天命，有的则把它归结为神启，有的把它归结为圣人之言，所谓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有的更干脆，简直就是以自己的独断作为真理的标准，所谓“六经为我注脚”。不消说，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哲学，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在真理的内容这个问题上答案基本正确，但是问题一涉及到真理的标准时，旧唯物主义的回答就陷于混乱。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很重视感性的作用，把感觉作为认识的起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同时又把经验当作真理的标准，这就错了。因为经验也属于感性认识的范围，说真理的标准是经验，无异说认识的标准是认识，在理论上和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

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解决什么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认为社会实践，也只有社会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从此以后，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的发展问题，以及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和核心。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特别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作用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都作了透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之所以正确，是它符合客观实际，它本身就是从千百年来人们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不断为人们的实践所证实。

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说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某种科学假说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据这种假说的推理是否严密，表述是否清晰，而是要看实验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和这种假说吻合时，才能最后证明这种假说的科学价值。一个军事指挥员拟订的作战方案是否无误，在战斗打响之前，只能作出种种估计，只有通过战斗的实践，才能得到验证。同样的，一个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实践结果来检验。当然，这决不是说，科学假说、作战方案、方针政策等等不需要利用间接经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间接经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当然是重要的，但这终究不能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关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任意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一句话，而且就是这一句话，也往往是经过他们掐头去尾地精心篡改过的，他们把这一句话奉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凡是和这句话或是和他们对这句话所作的解释不一致的，都可以被他们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帽子。经他们这样一搞，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为了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又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讲起。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上，是用实践来检验认识，还是用认识来检验认识，甚至用认识来检验实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斗争焦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作所为，就是要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倒退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了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只要会背语录，就等于有了真理，以至发展到了我选一段对我有利的语录，你选一段对你有利的语录，各自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大打“语录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极大的歪曲。

有的同志提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每一种认识都需要既用实践又用马克思主义

来验证，还是说有的认识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有的认识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论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一个问题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当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举例来说，现代自然科学中许多原理是否是真理，难道不需要通过它自己的科学实验，而由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原理就可以证明的吗？难道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一原理来判定高能物理学关于某种基本粒子的性质的推断和遗传工程学关于某种遗传密码的假设吗？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于真理的验证就成了多余的了，人们无需参加实践，一样可以证明真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给抽掉了。

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同为真理标准的同志，恐怕还有一种混淆，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真理，可以反过来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是这和真理的标准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性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有人认为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就意味着否认革命理论的

作用，这是没有根据的，是这些同志自己把问题混淆了。诚然，理性认识，特别是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真理对于实践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理性认识，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真理在内，它的基础是实践，也只能是实践，它不仅必须经过实践来验证，而且必须通过实践使自己不断发展。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包含了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 and 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无需实践检验、无需通过实践来发展的命定的、自明的、自我封闭的认识体系，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真理，只能是某个“先哲”的神秘的精神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可能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欲褒实贬，倒是真正玷辱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到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且涉及到我们的学风、文风、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如果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就是说，我们党的干部必须深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必须进行反复的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以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结论。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過程中，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我们据以判明是非、作出

决断的依据的，只能是通过实践而详细占有的材料，而决不能是某种现成的结论或者某种语录引证。按照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学风、文风、党风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是延安整风时期确立的党的优良传统。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如果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那么党的各级干部就无需深入实际，无需倾听群众的呼声，无需调查研究和占有材料，而只要会背诵现成结论，就可以指导工作。这样的学风、文风、党风，恰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毛泽东同志的历来主张的，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动。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根本谈不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我们的学风、文风、党风糟蹋、败坏得不成样子，在他们肆虐的时候，我国的确有被引上一条停滞、倒退的道路的危险。

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党中央正率领着我们进行新的长征，我们的面前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坚冰已经打碎，航向已经拨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充满着希望。不过，我们也应当充分估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马克思主义破坏的严重性，充分估计他们对我们党的学风、文风、党风败坏的严重性。他们所制造的理论混乱远没有被纠正，他们的流毒远没有被肃清。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毫不懈怠地努力作战！

恐右症的来历

研究医学的人总要探究某一种病症的来历。本文的题目一定会使得许多搞医学的同志瞠目不知所措。查遍医学辞典、内外科大全，哪有“恐右症”之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疑难病症呢？是一种稀有的地方病，还是一种新发现的罕见病？其实它既不稀少，也并非罕见，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过，它并不是什么生理上的病症，而是一种社会病、政治病。在中国，它的出现已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

那么什么叫“恐右症”？这种病症有什么特点呢？打一个比方，中国有句老话，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说的是一个人被蛇咬了以后，对蛇产生了一种病态的害怕心理，以至于看到了井绳，也以为是蛇，惊恐万分。这可以说是一种“恐蛇症”。被疯狗咬过的人会得一种“恐水症”，看见水老害怕。所谓“恐右症”，恐的内容和“恐蛇症”、“恐水症”不同，其为恐则一，都是对某一种事物或者某一种现象产生病态的恐惧心理。“恐右症”者，老怕犯右的错误，出右的偏差之谓也。这种病的患者对“右”字特别敏感、特别犯忌，以至于闻“右”色变，达到了病态的地步。有这种病的人为了表白自己并无“右倾顽症”，凡事“左”三分，宁“左”勿右，明知“左”得不近情理，也在所不惜。因此，这种病的特点，是用“左”来堵人的嘴，涂上“左”的保护色，以免授人以右的口实而遭